

【文化中国行】

东坡赤壁沉思

□闻立

车子转过湖北黄冈的黄州区坡仙路，一堵朱色石崖撞进眼里。友人说，这就是赤壁了。我们下车步行，左侧江水汤汤，右边游人如织。我默默思索，九百多年前的那位中年文人，是如何面对这片石壁的呢？他来时，没有整齐的台阶，没有镌刻着“东坡赤壁”的巍峨门楼，只有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。他来时，只带着刚从“乌台诗案”的御史台大牢捡回来的惊魂，还有一纸“责授检校尚书、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，本州安置”的诏命。

“团练副使”是一个闲散官衔，“不得签书公事”。彼时的苏子瞻，来到远离庙堂的黄州，开始学习如何做苏东坡了。苏东坡这个名字，天生就带着蓑衣竹杖的旷达与烟火灶台的亲切。可是完成这个转变，并不容易。初到黄州时，他寄居在定惠院，像一只惊弓之鸟，闭门谢客，只在夜深人静时，偶与僧人往来。他在给李端叔的信中写道：“扁舟草履，放浪山水间，与樵渔杂处，往往为醉人所推骂，辄自喜渐不为人识。”这“自喜”里，有多少是无奈，又有多少是惊悸后对隐身的渴望？一个曾经“有笔头千字，胸中万卷”的才子，如今所求几何，这其中的跌宕，绝非“旷达”二字可以轻轻掩过。

沿着石阶向上，游人逐渐稀少。到了二赋堂前，但见廊柱寂然，里面静悬着那两篇照耀千古的巨赋——《前赤壁赋》《后赤壁赋》。我屏息良久，只觉耳畔江流有声，眼前山月徘徊，恍然抵达了那两个初秋与初冬的夜晚。苏轼是在怎样一种心境下，写出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”的呢？这年他四十五岁，抱负成空，在宇宙浩瀚与自身微渺的对比中，他发出了这声震撼古今的浩叹。

那场关于“变”与“不变”的著名辩难，与其说是说服友人，不如说是自我说服。在他看来，江水不舍昼夜是变，江水未尝消逝是不变；月有阴晴圆缺是变，明月朗照千古是不变。这辩证的火花，在黄州的泥泞与困顿中激烈地迸发出来。眼前的赤壁，并非周郎破曹的赤壁，但对于苏轼来说，他在这里进行的内心交战，比任何一场战争都更为惊心动魄。这场战争里，他的对手是绝望和虚无，他的战利品则是“物与我皆无尽”的哲思，还有“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”的审美救赎。

转过一面山坡，便是雪堂了。这里背山面水，竹林环绕。当年，苏轼在荒地上躬耕，自号东坡居士。他在此筑堂，因在大雪天落成，正壁上画满雪景，故名雪堂。这是他在黄州真正意义上的家。他在《雪堂记》里模拟了客主问答：客笑他，你将雪堂布置得如同居士庐庵，但心里仍对功业念念不忘，这是“窃钟掩耳”。苏轼则说自己犹如“操舟而涉海”，虽暂时身寄雪堂，心却游于无穷之境。在这里，东坡作为地名和名号的同时，还是一种生存姿态，即在最低处扎根，向生活汲取力量。

友人在旁轻声诵起《定风波》：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这首词的序写道：“三月七日，沙湖道中遇雨，雨具先去，同行皆狼狈，余独不觉。”我们可以想象，那场“穿林打叶”的骤雨，不也是“乌台诗案”之后仕途起伏、生计困窘的人生风雨吗？他说“谁怕”“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大概也不是天生无畏，而是在被风雨浸透之后获得了内在的稳定与从容吧。

夕阳西下，游人散去，我们最后来到临泉亭遗址。落脚定惠院的苏轼，在家眷来到黄州后，一起迁居临泉亭。这里位置临江，视野开阔，“户外数步即大江，烟波渺然”。房屋虽然狭小，但江景宜人，成为他日常起居和会友的重要场所。离去的路上我陷入沉思。我今日追寻的，不止是那个半生笑对苦难的“乐天派”偶像，那面峭壁在江边沉默不语，仿佛在告诫来人：真正的矗立不是从未跌倒，而是在泥泞中依然能写出诗行。

节是古代文人举办诗会雅集、进行诗歌创作的核心节日，魏晋之后上巳节固定为农历三月初三，文人将祓禊仪式发展为诗意的雅集活动。西晋石崇的金谷涧集会就是类似形式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雅集，四十余位文人散坐兰亭清流两侧，将盛酒的羽觞放在上游顺流而下，酒杯停在谁面前，谁就要饮酒赋诗。这次集会诞生了“天下第一行书”《兰亭集序》，也让“曲水流觞”成为古代上巳节颇具标志性的文化习俗。

再如“梅祭诗圣”活动，起源于唐代杜甫与高适的“人日唱和”，至清代正式成俗，文人雅士固定在人日云集草堂祭拜杜甫。1992年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“复刻”此仪式，2011年入选第三批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这种以“梅祭”为载体，诗词、祭祀、赏梅结合的表达形式，让杜甫文化在当代落地生根。此外，还有各地兴起的清明诗祭、端午诗祭等活动，虽非古代意义上的“祭诗”，亦是当下以诗为媒的纪念活动。

祭诗，是文人对笔下心血的珍视，对诗道的虔诚。由此可见，“祭”字不止是敬献先祖的礼仪，文人这份郑重也敬给了诗、书、墨、画，其实是把自己的心血、对文化的虔诚，都安放进了这一场礼敬仪式里。当我们在祭诗仪式中吟诵千古佳句，那些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，能提醒我们，创作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，每一首诗的诞生，都需要付出心血。

（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、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）

诗看出，诗人像杜甫守岁、贾岛祭诗一样，检点一年所作诗文，在贫寒的处境中，仍不改对文字的虔敬，将“祭诗”作为辞旧迎新的重要仪式。

如果说宋元时代，岁末祭诗仅在部分诗人中流行，那么至明清时期，诗人效仿贾岛祭诗时期留下的诗作颇多，比如：明代文徵明的《除夕》：“人家除夕正忙时，我自挑灯拣旧诗”；明徐燧的《戊戌除夕》其二：“自祭诗神斟柏叶，欲驱穷鬼挂桃符”；明张琦《闲居十二首》其七“春来但觉诗神减，夜半烹鸡祭少陵”；清林则徐的《除夕书怀》：“漫祭诗篇思贾岛，畏挝更鼓似东坡”等。清代宫廷戏曲演出管理机构“升平署”曾将此事编为昆弋腔月令承应戏《贾岛祭诗》，作为除夕承应剧目，在道光九年至光绪五年间多次演出。不仅祭诗活动流行，还衍生出“诗冢”葬诗祭拜的礼俗。清朝大臣潘世恩曾作《诗冢歌》，岁末祭诗仪式上扫斋焚香，设酒果，肃拜，祝曰：诗魂有灵，佑我文思。此俗清末仍有传承，鲁迅1901年所作的《祭书神文》开篇便直呼“上章困敦之岁，贾子祭诗之夕”。

古人祭诗，坚信诗能“动天地、感鬼神”（《毛诗序》），为其设祭、焚香、酹酒，是将诗当作有生命的存在来敬畏，随之也出现了祭书、祭墨、祭画等习俗。这不仅是一种文化习俗，也象征着古代文人对文学创作的态度。其实，自贾岛以来诗人们的祭诗习俗，追溯渊源，也许是受前人诗歌文化仪式活动影响而生的。比如上巳

□卢恩俊

“祭”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，字形如手持鲜肉置于祭台之上，本义是向神灵先祖敬献供品，以表崇敬祈愿之意。除夕之夜，家家户户焚香祭祖，祈求来年平安顺遂。古代诗人贾岛，却在辞旧迎新之际，不忘进行一桩独具特色的“祭诗”雅事。

唐代学者冯贽《云仙杂记》卷四“祭诗以酒脯”条引《金门岁节》中记载：“贾岛常以岁除，取一年所得诗，祭以酒脯，曰：‘劳吾精神，以是补之。’”元朝诗人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卷五·贾岛传亦有记录：“每至除夕，必取一岁所作置几上，焚香再拜，酹酒祝曰：‘此吾终年苦心也。’”

据记载贾岛祭诗之流程有三：一曰陈列诗作，将一年所写诗稿整齐置于几案之上，视为心力所凝之成果；二曰焚香叩拜，点燃香烛，以酒脯为祭品，恭敬行礼。三曰诵祝辞岁，口诵祝词，以表达对诗艺的虔诚与自我慰藉。仪式结束后，贾岛“痛饮长谣而罢”，以酒助兴，借诗与酒辞别旧岁。

贾岛(779年—843年)，字阆仙，一作浪仙，唐朝著名的苦吟派诗人。他以“推敲”典故闻名，充分展示其在诗歌创作上的严谨态度。他一生以“苦吟”著称，自称“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”。他的祭诗之举，受到历代文人的崇敬进而效仿，逐渐形成祭诗礼俗。南宋著名江湖诗派诗人戴复古，是最早将贾岛祭诗典故入诗的诗人，在《壬寅除夕》一诗中明确记载：“杜陵分岁了，贾岛祭诗忙”。从整首

【观文所得】

从贾岛祭诗说开去

【短史记】

飞钱：唐朝的「移动支付」

□丁然

移动支付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但如果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，当时的古人就已经发明了“移动支付”来简化交易流程，大家会不会感到吃惊？

在我们的印象中，农耕社会里，最开始是以物易物，后来又出现了诸如贝壳、布帛、铜、铁、银等各种五花八门的实物货币。至于纸质银票，要到北宋才开始以“交子”的形式慢慢普及演变而来。那唐朝人是怎么使用“移动支付”的呢？

来看《宋史·食货志》中的一段话：“会子、交子之法，盖有取唐之飞钱。”根据宋史记载，宋朝钞票，也就是“会子”“会子”的发行流通制度，很可能借鉴于唐代的飞钱。

关于飞钱，《新唐书·食货志》中解释：“商贾至京师，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，以轻装趋四方，合券乃取之，号飞钱。”原来，当时唐朝的各地方都在京城长安设立了进奏院。这个部门有点类似于现在的驻京办，主要职能包括传递朝廷政令，递呈重要文件，通过上传下达，方便地方能及时了解朝廷动态决策等各项事

宜，并为进京办事的外地官员提供服务。

除此之外，进奏院还会为外地商人提供一种“移动支付”的汇兑服务。当外地客商在长安售卖完货物后，可将所得的各类金属货币存入本地方的驻京进奏院。进奏院随即出具一份牒券，上面备注好详细信息，接着将整张牒券一分为二：半张交由商人保管，另一半由进奏院派专人送回商人原籍的地方官府。而商人返乡后，只需到当地官府核验牒券，两份半张凭证能契合为一张完整的牒券，所有信息准确无误，便可取出贷款。

这套古代的汇兑流程，便是飞钱。它虽名为“钱”，实则并非流通货币，反而和咱们现在的银行汇票很相似。这种诞生于唐宪宗时期的“移动支付”，因人们仅凭纸券就能支取钱款，让钱财如同长了翅膀一般隔空流转，故而得名“飞钱”。

当时为什么会发明出这样的支付方式呢？方便快捷固然是第一因素。隋唐大运河的通航，让沿线港口城市迅速崛起，除长安、洛阳两大都城外，扬州、广州等地也成为商旅往来频繁的商贸重镇。

当这些商人远赴外地经商时，最大的困扰就是如何携带货币。虽然“腰缠万贯”这句话看上去很美，但不说万贯，只是几千贯铜钱，重量都得有几百斤，不仅携带不便，还容易遇到劫匪，风险特别大。

另外，《新唐书·食货志》里还提到一个原因：“宪宗以钱少，复禁用铜器。”由于唐朝铜钱短缺，于是朝廷曾下令禁止使用铜器，禁止铜钱外流。如果商人随身携带大量铜钱出行，不但不方便，还很容易触犯禁令。在此背景下，“飞钱”这种带有汇兑性质的“移动支付”方式，便发展成为全国经商通用的转账工具。

除了商业贸易，飞钱汇兑也深受民间百姓的喜爱。唐代大臣、文人赵璘在《因话录》中记载：有读书人在外地变卖完产业，得钱数百贯，因为路途艰险，携带巨款不便，便专门托熟人将钱款存入官库，自己领取凭证藏于衣服口袋，轻装返乡。这便是当时人们俗称的“便换”，也就是飞钱。作为原始的汇兑方式，飞钱依托于朝廷信用，实现了货币的便捷流通，也为后来纸币交子的出现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。